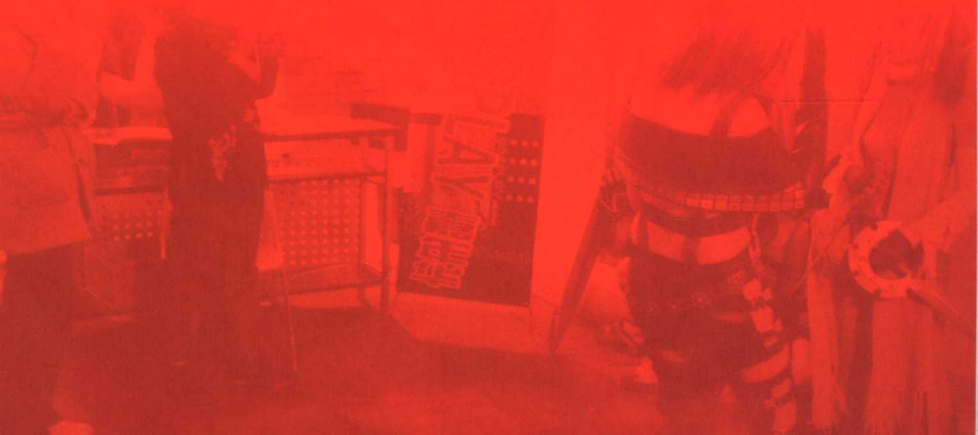


主编 王逢振

翻译 李 丹 李花丽等

通俗文化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主编 王逢振

翻译 李 丹 李花丽等

通俗文化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俗文化研究/王逢振主编;(美)威廉姆逊等著;
李丹,李花丽译,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
ISBN 7-201-05017-6

I.通... II.①王...②威...③李...④李...
III.文化—研究—文集 IV.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391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迁安万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850x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插页

字数:140千字 印数:1-5,000

定 价:16.00元

前 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视觉文化和流行文化正在取代传统的文化形式,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正在形成一种强势文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以及以美国为主体的网络文化,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不仅融于经济,经济也融于文化。因此,二十世纪后期,文化研究开始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同时在我国也开始兴起。

文化研究对传统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不少焦虑和争论。但文化研究仍然在不断发展,甚至形成了强势。有人说,文化研究贴近当前的社会现实,具有干预社会的功能,因此应该提倡;也有人说,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时之时髦,最终要回归到文本的审美研究;还有人说,文化研究过于泛化,把一切都纳入文化研究,淹没了文学研究。可以说,兴奋和焦虑并存,争论会继续下去。

本人认为,对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具有综合辩证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必排斥审美研究和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的审美研究和文学研究也不必拒斥文化研究。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敌对。许多进行文

化研究的人,不仅知识背景是文学研究,而且所用的方法也是文学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多种多样)。他们并不是排斥文本,也不是不细读文本,而是扩展了文本的范畴,把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当作文本,文学文本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文本。不论是社会文本(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字文本(文学作品),还是艺术文本(绘画、音乐、影视、建筑等),都是他们细读和研究对象。对这些文本,他们像对文学作品一样,都进行仔细观察、解读,并进行具体分析。那种认为文化研究脱离文本的说法,无非是指脱离传统的文学文本。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文学文本同样是文化研究细读和研究对象。

文化研究既是恢复人民的愿望,让边缘化的群体的文化发出应有的声音;同时又说明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加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构成。一方面,文化研究联系普通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与传统文学研究所称的文化相对;另一方面,它力图说明人民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他们如何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如何运用文化形式,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何受到无法控制的力量限制,等等。例如我国关于城市生活的电视剧,其中豪华的室内装饰和汽车等场景,一方面再现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一种超前消费的意识形态。又如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一方面再现人民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把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

文化研究特别注意有争议的同一性和身份问题,注意构成身份的多种方式,也注意体验身份和表达身份的方式。因此文化研究特别注意研究一些群体不稳定的文化和文化身份,例如少数民族问题、移民问题、妇女问题和社会“另类人”的问题等

等。因为这些群体难以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种中心文化认同，常常处于边缘和被歧视的地位。实际上，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的构成。

当前，文化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资料，我们编选翻译了五本文集，包括《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西方学术大师访谈录》、《大学里的资本主义》、《消遣娱乐的文化研究》和《静和动：影视新解》。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文化研究的现状。《演讲集》和《访谈录》既涉及文化研究也涉及文学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大学里的资本主义》重点探讨大学教育问题，包括大学商业化的问题，对我国教育具有实际的借鉴价值。《消遣娱乐的文化研究》主要收集了有关广告、通俗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文章，对这类通俗文化进行了理论阐述，提供了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和范式。《静和动：影视新解》对视觉文化和媒体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例说明。当然，仅仅五本书很难全面反映当前西方文化研究的现状，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其中一些方面。

有人说，严格讲翻译是不可做的。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来的某些东西，甚至会有“误解”——“误读”现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误读”，但有“肯定的误读”和“否定的误读”。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或翻译）原作的意义。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好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多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至于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毫无疑问，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我对天津人民出版社和藏策先生为这些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逢振

目 录

女人是座岛屿——女性气质与殖民化	(1)
论女性的纳入——北美与墨西哥流行叙事比较··	(13)
时尚话语片断	(35)
恐怖的快感——论当代恐怖电影及后现代理论··	(53)
短暂的相遇——大众文化和意义的转移	(66)
的士高骑士:纽约地下舞曲的无名英雄	(94)
竞争的寓言——女性气质与殖民化	(104)
体育与情节剧——墨西哥职业摔跤纪实	(116)
鲁伯特对克里:男人的情节剧	(133)
从学院山观拳击峰三景	(154)

女人是座岛屿

——女性气质与殖民化

朱迪斯·威廉姆逊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备宣传武器的生产方式，一种企图吞噬整个世界，然后压制所有其他经济模型的经济方式，不能容忍身边有对手与之竞争。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是第一个不能独立存在，需要其他经济体系充当媒介和土壤的经济方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环境。

——罗莎·卢森堡^[1]

小资产者是无法想象他者的人，……但有一个应急的方法——即异国体验。

——罗兰·巴特^[2]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暗含着一种差异：“大众”文化与某种其他类型文化间的差异。这种其他类型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因为单是暗示选择的存在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我们或多或少是自愿参与大众文化的。在某种程度上，研究一种文化应以置身其外为前提，尽管时髦的做法是像乔治·奥威尔那样身体力行，深入到大众之中。最近，一些左翼学者自豪地

承认曾对《外星人》大惊小怪过,这很奇怪却很真实。不无矛盾的是,你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从消费(批评)大众文化制品中获得的乐趣就越多:在这个领域的对面露营。

有两种差异是语义不可或缺的,一是词语间的差异。依索绪尔之见,一个词不同于其他所有词,从而派生意义。^[3]“猫”不是“狗”,不是“马”,“自然”不是“文化”,“大众文化”不是“学院文化”。二是词语或标记与所指物间的差异:“猫”这个词不是一只猫,或者说它代替不了猫,而猫本身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猫,它可以代表迥然不同的事物,像好运或巫婆。“自然”这个概念有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构成,不是包罗万象的自然界。“大众文化”一词的所指不是制品本身、电视节目等等,而是观看它们的人即“群众”:对学术界的我们来说,他们必须作为“另类人”出现,否则我们就不会有研究客体,只有研究主体——我们自己。

把目光转移到界定“大众文化”的差异之外,我们发现需要新术语,或者旧术语,我认为旧术语中意识形态的概念用处最大。人们或许觉得通过电影、电视杂志或通俗小说,可以自由出入于意识形态,而如今我们已知道不该妄想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外。在马克思主义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包含权力、职能和阶级的含义。广义上讲,关于大众文化“文本”中所表现的大部分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占主导或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很可能同离“群众”最远的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数意识形态的职能是抑制差异或对抗,为达此目的的最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确立差异,正如拉克劳在讨论民主主义时提出的。^[4]他认为平民论意识形态通过制造一个支配与被支配团体间简单的二元对立而起作用,两个团体完全由他们共同的“差异”而不是真正的差异来界定。

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所以对作为实在形式出现的“差异”司空见惯。不管是以“制衡”的形式,像一些争论性的电视节目展示给我们的截然相反的观点,还是以“选择”的形式,比如我们购物时能在不同品牌的脆玉米片之间加以选择。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正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一面在内部尽可能地呈现差异,一面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消灭异己力量: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最高的招数就是在自己内部生产出对立面。那些在内部表现出的差异——我们的文化如此慷慨地提供的——很大程度上是被捕捉到的外部差异的复原。我们的文化深深根植于帝国主义中,需要消灭真正的差异,把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外的东西据为己有;同时需要差异的构成来指称自己。我要谈的不仅是差异和他性在大众文化中的表现,还有这种表现的重要媒介——“女人”。

精神分析学研究了性别差异的社会构成,从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作者强调了两性实际的身体和心理差异,后者虽然属于文化范畴,不是与生俱来的,看上去却是自然的,因为由生物差异所“承载”:他用剃须刀,我用伊玛克(女性脱毛器)。但是,也可以进一步去研究“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不考虑它们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本身显得很自然,在意识形态内被用来“承载”其他重要的差异:包括“自然”与“文化”间的。精神分析关注过“女性气质”的能指,然而,能指链无休无止,它自己又会成为其他意义的能指,其中有很多相互抵触。我要考虑的不是性别差异的精神分析构成,而是在我们特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性别差异所承载的差异和“他性”的表现。列维-斯特劳斯指明了在其他文化中,差异的自然体系——例如动植物的——是如何被用做社会差异

重要性的载体并组织社会结构的意义。类似的做法在我们文化内也起着作用。正是“自然的”，这种情况下应是已“被自然化的”东西承载着社会意义。^[5]正如弗洛伊德在论及一种神经官能症时所说，它的至爱是一个能藏在其后的美好、坚实的现实，社会神话也是如此，所依附的结构越“真实”，它们就越顽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女人代表的似乎是历史之外的生活的另一面——人际关系、爱和性——结果，生活的这些方面竟然好像变成了“女人的领域”，但是，广义上讲，这也是大众文化的领域。很多大众文化在闲暇、家庭或私人生活和家等“女性”地带发生或被消费，而且还把这些地带作为再现的主题。这块“女性”和“大众文化”共用的领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就在于它能超越阶级。如果在意识形态再现差别时不再关注社会非正义和阶级斗争，那还有什么能比强调超越阶级的差异——“永恒”的性别差异——或那些比阶级范围更大的民族更好的呢？对于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白种男人来讲，最可能的他者要么是个女人，要么是个外国人——尤其是黑人。总而言之，这个人不可能属于操纵他生活的阶级。

因此，大众文化之中的“女性气质”形象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不是这些形象所展示的，而是它们所隐匿的。如果“女人”意味着家庭、爱和性，那么，一般说来，“女人”就不意味着工作、阶级和政治。这并不是说家庭、私人和性等生活方面不是政治的：远非如此，只是阶级权力的问题常常躲在无处不在、不容置辩的性别差异之后，这种差异的独特魔力让我们想忘掉的（或者说像安德尔·高尔兹那样想告别的^[6]）政治和社会划分失去了意义。在大众文化中，这种现象在《每日镜报》的情人节标题里出现过：“不列颠先生，这是您妻子”，附带着一系列让人分辨不出是何阶

级的母亲和孩子的照片,代表着普遍的/民族的妻子和母性。在学术界,同样的症状常常一样显而易见:强调说明性别(而不是阶级),关心(无种族的、无阶级的)性别主体的建构,最重要的是,对“欲望”的迷恋。自不必说这些领域很重要,但对它们的重视离不开对其他问题的忽视。例如,说和写不仅和“欲望”有很大关系,同阶级也一样。但是,性欲和“欲望”对我们大家都很特别,这正是它们成为时下“热门”话题的魅力所在。我的柯尔曼,点燃我的火焰!

当人们不再把“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作为超越时间的精神普遍存在,转而考察为现在的文化做铺垫的具体历史结构时,差异的纯“指称”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了,我们就能看到男/女划分表现了什么样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划分得非常细致的范围之中:工作/闲暇,公共的/私人的,政治的/家务的,经济生活/情感生活,不一而足。这些划分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价值。如果出现一场罢工(工作/政治领域),深受其害的会是“老百姓”、“家庭主妇”、“消费者”(家庭的/私人的领域)。人们忘掉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能同时隶属两个领域。例如,有人描写矿工绑架纳税人以勒索赎金,好像矿工不是纳税人。但是,正是差异使意义成为可能,虽然实际上这些领域并没有彼此分立,但正是因为它们分裂为成对儿的意识形态,才赋予它们以意义。对以“家”为工作场所的女人来说,它不一定与“闲暇”同义,对于工作的男人,“家”却意味着工作的对立面。大众文化之所以与工作或政治联系不甚紧密,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打开电视是为了忘掉它们。随着精细的文本分析过程渐渐掩盖了这些制品在日常生活中的职能,这一显而易见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常常被我们当中那些负责观察大众文化并为其著书立说的

人所忽视。大部分工作生活都具有剥削性,许多社会、政治生活具有压迫性,人们想从中彻底“解脱出来”,所以,工作与闲暇之间的严格区分在感觉上是很必要的。

活动彼此分立,价值亦然,也以同样的精神分裂症的模式,引起了逃到私人生活中去的冲动,因而,当社会声称它所珍视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爱心、分享、自由、选择、个人发展)——被所有小报作为主题刊载的人的热情或伤心故事的价值——出现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会被认为很不协调。然而,它们在这方面的空缺却有办法弥补:把它们作为文化的基石安置到女人身上和家庭内部。女人,“私人生活”的监护人,变成了垃圾场,用以堆积社会不想负担却仍佯装珍惜的价值,一种酷似动物园或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借此,文化就可以自豪地宣布,被它排除在外的恰恰也是被它包括在内的。资本主义就能以自由与完满的形象示人,“瞧啊,我们的制度提供这个”。实际上,这些价值之所以被塞进私人生活(而且被塞得很紧),是因为它们是被其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否定的,虽然这种制度建立在竞争价值和利润价值的基础之上,导致调控及选择的缺失和异化。在这个剥削之海中,女人是座岛屿,这看来千真万确。

因此,当我们面对核武器的问题几乎别无选择时,会以为自己拥有自由和幸福,因为在我们以女性气质为代表的私人生活中包含这些因素。推测起来,这一领域原应迥然相异于资本主义制度,却在经济上、生产意义上对其至关重要。家庭为现代消费经济提供了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在英国 80% 的购物活动是由女人完成的。家庭与性欲的“自然”现象反映出“自然”经济的形象,而经济通过大量的产品渗透并构筑了这些“自然的”、“私人的”领域——豪爽地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差异场所提供给

我们：旁氏乳液可油全身适用；这里，或者那里。

这里，女人与殖民地被彻底混为一谈：斐济是座岛，却仅仅被当作香水；而使用香水的人，女人，被变成一般化的笼统的岛，散发着异国情调。阴性与异国性珠联璧合，因为“法国人特区”使二者殖民化，用红、白、蓝三色国旗围住了这一方天地。女人是岛，因为她神秘、幽远，是度假的场所，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座岛，像殖民地一样被殖民者包围、隔离，在单调的海洋中作为他者，保持着完美无瑕。假如斐济香水可以被裹在女性别致的法国围巾里，女性同样能被华丽地包在文化中，不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产品，而是一次包办的自然之旅。

“这里，或者那里”暗示着性，禁区：照片显示了足够多的“这里”即可见的皮肤，“那里”则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旁氏适用的最幽暗、最隐秘的地方。“全身”既危险又安全，指向极端——甚至是“私隐的”！——“那里”是他者，最远的地方，性；但是，“这里”同“那里”之间的沟壑被旁氏“民主的应用”抹平了——它不讲差异。

在消费中，我们似乎拥有选择权，在人际关系中，我们似乎拥有自由。只要女人们以个体形式替社会负担这些价值，就不必使其在社会意义上生效。以“女人”的身份来反对炸弹的女人，不是在有效地利用社会自身的价值来对抗社会，就是承认社会意识形态所解释的她们天生就更有爱心。不论人际关系、情感和爱心的价值用处何在，加载到女人身上的价值与从社会现实和经济活动所卸掉的成正比。

这一点能在日常术语中见到，作为工作对立面确立起来的“私人生活”成为了工作的理由：人们奉劝男人（好像只有男人才出去工作）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便赚更多的钱，为家和家人保

险,为孩子投资,拉长闲暇时间,支付更多的金钱为刺激的假期,等等。每天的苦差只是因为工作以外的生活才有意义。由此看来,为社会结构辩护用的是私人的、个体的而不是社会的词语。这表明分立与差异,词语间的对立是如何不同,但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在现实中生出意义。同样,“女人的”与“私人的”是储存社会想摆脱的价值的仓库,这一观念在英国现行政策中表露无遗,直截了当地推断女人们会自己在家完成成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而且不计报酬,于是便谨慎地取消了这些服务。政府貌似拥护个体、家和家庭,那里却正是它丢下累赘的场所:这实际上说明了符号与所指物间的分立,“回归家庭”代表的事物不同于伪装成责任的辛苦,辛苦实际正在被“还给”真正的家庭。

如果这种“具体的符号学”有些牵强,会有人问另外哪一种符号学可能在政治上有用武之地呢?我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项试图理解结构及其内容的事业——与意义体系相关,但其意义只在真实的历史体系中运作。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吞掉他者,又要利用“他性”,这并不是一个结构和意识形态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尽管是建立在罗莎·卢森堡在文章开头引文中描述的帝国主义关系之上。如果女人是父权制资本主义文化心理上伟大的他者,那么,那种文化赖以生存的他者就是殖民地,如卢森堡所言,它既要剥削又要消灭殖民地。资本主义不是能独立平衡运转的体系,它总需要失衡,需要与自己不同的事物:漏洞百出,矛盾重重,不能自足。我们目前的生活标准部分得益于“发展中国家”被跨国公司剥削的、廉价得不可思议的劳动力,他们给生产出许多的消费品,工资却极其微薄,换成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还得益于对国际范围内市场的控制。西方国家的银行提供巨额贷款,收取巨额利息,导致东欧集团国家的贫困。政治

上,我们千方百计地消灭他者,在经济上我们又需要它。

因此,殖民地经济与家庭境遇相同,资本主义滋养着各种价值体系同自己之间的象征性差异,同时以这些体系为生并操纵着它们。“自然的”和“异国的”,国外的地方和人们的秘密,既同我们的文化分立,又是它振奋人心的产品:发现柔嫩肌肤的热带秘密。旅行和度假广告,以商品的形式呈现给我们其余的世界,总是被描绘为与西方“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却显然容易被西方文化包装。个人心理上,被抑制的并未消失,而是被症候或梦幻形象所代表或取代,所以,就整个世界而言,被资本主义抑制的各种生产体系(殖民体系、封建体系)已被纳入其意象和意识形态价值中去:作为古老、迷人、异国情调、自然、原始、普遍的“他性”被纳入。

现实中被带走的东西在印象与意识形态中被再现出来,这样,在它消失后,它就代表着自身。旅行印象中“异国文化”,那“丰富多彩的习俗”,那比我们自然得多但同时为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自然性的人们——所有这些他性的印象都有实实在在的他性做所指物,这个他性过去曾经而且现在仍在被系统地破坏着,先是被欧洲资本,而后是美国资本。正是“自然的”、“基本的”文化概念保证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永恒性(以及,不无讽刺的是,普遍性)。从其他社会身上读到的是我们自己社会的价值体系,我们设法按照资本主义之外的“自然”生活来使我们的社会权利结构自然化。用家庭来突出工作,而不露阶级的痕迹,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来利用其他社会,例如,既然女人和农民可以被描绘为“自然的”、“自主的”,那么,轿车广告选用了那么多的女人和农民形象,也不足为奇。^[7]正如表现另外一种商品的价值的商品会在此过程中失掉自身,那些“原始人”——女人和外国